

淺談召開

『中國·棗陽雕龍碑文化研討會』的意義與作用

胡久明

襄樊市炎黃文化研究會與襄樊市、棗陽市兩級政府及其主管部門共同籌備的「中國·棗陽雕龍碑文化研討會」，於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棗陽市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和專家學者及特邀佳賓有：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會、湖北省暨棗陽旅台同鄉會、湖北省文物局、襄樊市、棗陽市等各級各部門有關領導和全國各省（市）及台灣考古專家學者四十餘人（詳見本會會議紀要）。大會開始舉行隆重的開幕式，有各級有關領導和專家代表在會上分別講話。並參觀雕龍碑文化遺址發掘現場和發掘出土器物標本陳列室以及周邊地區古文化遺址發掘分布圖等會

議安排的活動程序。

研討會由中國故宮博物院原院長、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史前考古專家、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忠培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邊疆考古中心主任、研究員王仁湘等專家分別主持，並由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黃衛東作雕龍碑遺址局部發掘研究成果報告；王仁湘研究員作《雕龍碑史前彩陶》專題報告；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雕龍碑遺址發掘主持人王杰（因病未能出席會議）向大會致信並遞交了『超前的智慧，文明的見證』為題的論文。與會專家學者結合前期研究成果，經過認真分析和充分討論達成共識，最後由張忠

培先生作了總結，使研討會取得圓滿成功。

我認爲，『中國·襄陽雕龍碑文化研討會』的成功召開既有其重要的歷史學術研究價值，又有其深遠的現時意義。

(一)

會議的籌備階段，有效地推動了《襄陽雕龍碑》和《雕龍碑史前彩陶》兩個報告的出版。襄陽雕龍碑遺址，自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二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杰等同志主持進行局部發掘後，至二〇〇二年的十年時間裏尚未編著出版發掘報告和召開遺址文化研討會論證定位。爲了推動這一工作，我們襄樊市炎黃文化研究會，從二〇〇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成立時起，就以襄陽雕龍碑文化遺址作爲研究炎黃文化的歷史支撐點，我並撰寫了《炎帝農時代與襄陽雕龍碑文化遺址》的文章，作爲襄樊市炎黃文化研究會學術研究會的開頭篇，同時，聘請王杰教授任襄樊市炎黃文



張安培、李發強、胡久明先生
雕龍碑文物管理處工作人員合影留念

化研究會顧問。並及時商請襄樊市、襄陽市兩級政府及其文化主管部門的領導和王杰教授同意，於二〇〇二年九月十一日由襄樊市人民政

府正式行文成立了「襄樊市棗陽雕龍碑文化研討會籌備委員會」推選我任籌委會主任，襄樊市政府副市長曹敬蘭、襄樊市政協副主席李文烈、棗陽市副市長張洪全（後因人事變更副市長為邱光秀）等同志任副主任，其他有關同志為委員，並成立辦公室，及時擬定了籌備工作方案和人員具體分工，積極開展籌備工作。當時工作重點是以編著出版發掘報告——《棗陽雕龍碑》和《雕龍碑史前彩陶》兩本書早日出版，我們曾先後四次赴北京會同王杰教授商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領導和有關同志將此項工作列入議事日程，由於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於二〇〇六年四月中旬迎來了棗陽雕龍碑》和《雕龍碑史前彩陶》的正式出版，為我們召開「中國·棗陽雕龍碑文化研討會」創造了條件。特別要感謝王仁湘、王杰教授，為展示了展示雕龍碑彩陶藝術，配合《棗陽雕龍碑》主題報告，他們於二〇〇三年十一月曾冒著寒冬大雪紛飛的天氣從北京來到棗陽雕龍碑遺

址，為《雕龍碑史前彩陶》的出版進行拍攝和編輯工作，令我們十分感激和敬佩。這本《雕龍碑史前彩陶》藝術成爲《棗陽雕龍碑》報告的姊妹篇，增加了豐富的內涵，得到與會專家高度贊揚與好評，會議主持人張忠培院長說：「在《棗陽雕龍碑》發掘主題報告出版的同時又出版了《雕龍碑史前彩陶》的作法非常好，這是考古遺址發掘報告的一個創舉，應該得到重視和推廣」。

(一)

這次會議確認了「棗陽雕龍碑文化」的地位。與會專家學者根據報告的成果和自己的分析研究，進一步提高了對雕龍碑文化的認識，有效地探討雕龍碑文化與長江、黃河流域史前文化的交流、融合、創新、發展，進而形成自身獨特文化內涵。會議對雕龍碑文化的性質的確認問題進行深入研討，雕龍碑一期是雕龍碑文化的第一個發展階段性類性，不具備構

成新文化類型條件，故暫定為雕龍碑一期。雕龍碑二期是繼承前一期發展演變的第二階段，具有傳統、創新和多元特徵，目前尚未發現與年代相同的同類文化，而自身特徵亦顯著，類似處在過渡演變階段，因此判定為雕龍碑二期。雕龍碑三期是繼承前二期經過傳統、創新和多元化碰撞、融合成為獨具特徵的文化類型。它具有一批特徵鮮明的代表性文化遺存，如大型多間式住房建築佈局，使用類似「水泥」性質的混凝土結構和推拉門等；成人墓葬統一隨葬豬下頷骨，嬰兒瓮棺葬具統一器型。有一批代表性陶器，如鼎、罐、瓮和擂鉢等器平底下附加矮圈足。這些特徵是雕龍碑三期文化有其一定分佈範圍，從發掘報告說明在襄樊市所屬區域和南陽市所屬部分區域，雕龍碑三期文化資料新穎、內涵特徵豐富鮮明和具有典型代表性，因此，會議根據發掘報告成果表明和專家討論意見將雕龍碑三期認定為「雕龍碑文化」。如王仁湘研究員在展示和解讀《雕龍

碑史前彩陶》專題報告時說：「雕龍碑是一種新文化」；「雕龍碑是中國考古事業的一座豐碑」。張忠培教授在總結講話中說：「雕龍碑遺址最具特色是第三期，但一二期也有特色，不能簡單地判為一種文化，有它的相對獨立性。所以，雕龍碑文化的意義就在於構成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一個重要樞紐，是一個驛站，在這裏所體現的文化顯示了它是一元為主，有多元結構因素的一種文化。」

(三)

會議對雕龍碑文化與周嶺史前文化的關係進行了深入研究與對比，一致認為「雕龍碑文化」是周嶺其它文化不可代替的一種獨具自身特色的文化。據碳十四測定的數據為距今六三〇〇——四八〇〇年間長達一五〇〇年的歷史。雕龍碑文化發展處於領先地位，如住房建築的先進性，發明人燒製的石灰和優於石灰與水泥性能相似的建築材料。農業工具的先

進性，以及水旱作物稻、粟糧食的豐收促進了家畜養豬，製陶和紡織業大發展。豬的產量在隨葬豬下頷骨墓中得到證明。製陶業使用輪製批量生產的陶器遠播長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和鄂西北的仰韶文化，特別就其數量、種類和色彩、紋飾圖案的多樣化，是周邊其它文化不能比擬的，另有一些蛋殼彩陶，陶質細膩，薄如蛋殼，製作難度很大。這類器皿非一般氏族所能享用的。

紡織業的發展，從發現的五〇〇多件大、中、小型陶紡輪工具中不僅能證明其產量，而且還能證明產品有粗細之分。

目前發現週邊早於和相當於並且有相同文化因素的遺址，只有浙川下王崗仰韶文人一二期文化，特別是前兩期。從年代看，據《浙川下王崗》其年代為距今6335±190年，比雕龍碑一期略早。從雕龍碑一二兩期出土的遺物看，相當於王崗文化二期的中晚期。雕龍碑二期文化中有大溪文化特徵的陶器和仰韶文

化特徵的陶器，但很少，兩者相加不過二十%。雕龍碑文化三期的走向與隨州的西花園和宜城的曹家樓兩處遺址發掘出土的資料對比，走向十分明確。西花園遺址大部份早期遺存屬雕龍碑文化三期偏晚，再晚是屈家嶺文化。曹家樓遺址一期屬雕龍碑文化三期偏晚，二期是屈家嶺文化。上述材料表明了雕龍碑文化走向與周嶺遺址文化的關係。

(四)

與會專家認為，雕龍碑遺址考古發現，當屬我國二十世紀重大考古成果，有著獨特的文化現象和重要學術研究價值，它是國務院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一處不可多得的國寶，要加強保護和利用。因此，專家們建議：首先要盡快作好保護規劃。鑒於二〇〇五年棗陽已委託國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編制《雕龍碑遺址保護規劃》，盡快落實；其次雕龍碑遺址已列入國家「十一五」期間「大遺址保護項目」，應積

極爭取國家支持資金到位；其三，要切實加強雕龍碑遺址發掘過程資料的整理和保護管理，使其永遠妥善保留；其四，要積極利用雕龍碑文化遺址行唯物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積極發展旅遊事業，為現時「三個文明」建設服務；其五，要加強組織領導和考古隊伍培養建設。為了作好雕龍碑文化遺址保護和利用規劃，長期有效地管理好，必須加強領導，組織專班，進一步培養好自身的專業隊伍，以適應雕龍碑文化遺址高標準、嚴要求的管理需要。

(五)

「中國·秦陽雕龍碑文化研討會」成功召開，進一步揭開了炎帝神農時代的輝煌。在雕龍碑文化遺址五〇〇〇〇平方米中局部發掘一五〇〇平方米，發現距今六三〇〇（上限）——四八〇〇年（下限）一五〇〇年的時間裏，在文化堆積厚度達二·五米文化層中，上下疊壓著三個不同時期的房屋建築基址二十一

座，貯藏窖穴七十五座，動物葬二十三座，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等遺物四〇〇〇餘件。

雕龍碑文化遺址是一處距今五六千年前原始農耕經濟階段先進氏族聚落遺址，特別這一時期的三期文化五三〇〇——四八〇〇年，是史前新石器時代較為先進的農業生產工具與農業生產發展、建築材料發明與建築工藝、製陶業，紡織業、醫藥等各方面所反映的生產水平和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與我國古文獻記載中的炎帝神農時代的傳說是一致的，文化遺址的發掘為我們了解和研究炎帝神農時期的歷史，提供了實物證據。雕龍碑文化遺址與古文獻記載傳說中的炎帝神農故里隨州烈山，相距只有七十多公里，同處於「隨棗走廊」之內，有關炎帝神農烈山傳說的記載是很多的。《禮記·祭法》鄭玄注曰：「烈山氏炎帝也，起於房山，或曰：有烈山氏。」這說明作為南方部落首領的炎帝神農「起源於烈山」是有歷史根據的。不僅雕龍碑文化遺址的年代與炎帝神農相

符，而且建國後發掘的雕龍碑周邊其它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其文化性質也都與雕龍碑遺址相同或基本相同。

炎帝神農歷史來被尊為中華民族始祖，他開創了中華文明史，過去多停留在文獻記載

上，而雕龍碑考古發現，揚開了我國原始社會炎帝神農時代曾有過的輝煌，文明時代許多源頭發現在雕龍碑文化遺址中。



張安培（左起四）、胡久明（左二）
台灣各位佳賓在遺址合影

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方酉生撰文指出：「在這次棗陽·雕龍碑文化研討會上，已有學者提出雕龍碑文化與神農氏的關係問題（指我撰寫的「炎帝神農時代與雕龍碑文化遺址」一文），這是有道理的，值得重視。不但如此，而且更重要的是雕龍碑文化遺存也與黃帝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下面將雕龍碑文化遺存炎黃二帝的關係作一論述：」。這就充分說明與會專家學者對於對雕龍碑文化遺址與炎帝神農時代的輝煌發展史的印證取得共識，而且並將深入的與炎黃二帝聯繫進行研究與探討，是一個有著重要歷史意義的學術價值的新課題，更進一步說明提出「炎黃文化與考古遺址文化」的印證研究，是一種創新的學識，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時意義，可以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and 創造力，可為五千年中華文明史源頭提供物質證據，更好地研究歷史文化，弘揚炎黃精神。

註：本文有關雕龍碑史料引自《棗陽雕龍碑》、《雕龍碑史前彩陶》報告。